

中国当代新诗潮论

梁云 著

春风文艺出版

第一章 朦胧诗的崛起和论争

1979年,我国诗坛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诗歌流派——朦胧诗。这个诗派一登上诗坛,就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对“四人帮”遗留下来的帮腔帮调的诗风进行了无情地扫荡,对人们还不太习惯使用的真挚热烈的感情表达方式加以不容质疑地确认,对人们经历过十年浩劫,留在他们心头上的隐隐创伤,给予人道主义地揭示和抚慰,对百废待兴,一切都处在重新解放和拨乱反正中的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取向,作出了极有代表性地引导和回答。

谁也不会忘记,当朦胧诗以它的思想和艺术的震撼力站稳在当代诗坛上,并引起诗坛上下的震动,为朦胧诗的崛起而进行的理论争议长达五年之久。1979年到1983年,当代诗坛围绕着朦胧诗现象进行了热烈认真地批评,从初级的“懂”和“不懂”的直接感受出发,发展到对当代诗歌美学原则崛起的再认识,经过五年时间的催化,人们终于清醒地认识了朦胧诗的文化思想价值,这个历史过程的完成,最初取决于北岛和芒克在北京创办的一个民间刊物《今天》。《今天》于1978年10月在北京创刊,创刊的目的是为了发表和当时仍在流行的帮腔帮调的诗风完全不同的诗。与此同时,渴望创新的诗人就把这代人对诗的使命和责任感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北岛和芒克在《今天》创刊号宣言中说: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在心

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再等待了，过去，老一代作家曾以血和笔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立下了功勋。但是今天，作为一代人来讲，他们落伍了，而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这代人的肩上。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①

这篇近乎单纯的宣言，只是发出了一代人为新诗的崛起需要行动的信号，至于他们所追求的诗歌前景究竟是什么样的，宣言中没有明确阐述，或许在他们头脑中还没有完全形成这种蓝图，或许出于急待喷发的情感激动的诱惑，他们只能为自己留下这样的空间——在创新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新诗的路本来就不应该是现成的，它是由众多的探索者——一代青年诗人的脚步积累而成的。正是抓住并顺应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契机，以北京为中心，以《今天》为阵地，全体朦胧诗人们便以他们不同的姿态和个性，在《今天》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

北京的顾城，跟随父亲顾工在乡间放猪时，就写下了大量的《生命幻想曲》：“太阳是我的纤夫”，“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用黄金的麦秸，织成摇篮，把我的灵感和心/放在里边。”回到北京之后，顾城把他在乡间编成的诗集藏在床底，有一天，他看到北岛们在《今天》上发表的诗，激动得陷入了沉思。南方的舒婷，在闽西农村插队时，就用诗和青年朋友沟通友谊。回城待业之后，她的思想更加成熟，“从海岸到峻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当有一天，她读到了北岛的诗，内心却爆发出八级地震。“北岛的诗的出现比他的诗本身更激动我。”“好象在天井里挣扎生长的桂树，从一棵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阔，联想到草坪和绿洲”。^②顾城和舒婷走向《今

天》的经历，足以证明用诗来探索自己和时代命运的青年人，尽管素不相识，一旦社会环境和气候允许他们沟通时，他们内心深处的共同点就爆发出来，汇成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这种汇集体现了朦胧诗人的群体力量，同样向他们提出一个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要发出一代人的心声和呐喊，光有内部刊物的交流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更公开更合理的形式，把自己的诗向社会发表出来。而当时的诗坛也正在期待着这种变革。1979年，辽宁《鸭绿江》杂志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测验结果表明，读者对诗歌的审美品味，已经从僵化空洞的诗风里解放出来，他们强烈希望看到新诗的品种出现，尽管他们不知道新诗是什么样子。读者审美需求的变化导致诗坛危机的信号不断出现，诗歌刊物销量剧减，诗人陷入苦闷之中。这一切，无疑为朦胧诗登上诗坛并在读者群中震荡，准备了水到渠成的条件。

1979年3月，北岛的《回答》首先发表在《诗刊》上。接着，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和顾城的《一代人》也被发表。朦胧诗在全国各地诗刊被采用，很快形成了崛起的势头。1980年10月，《诗刊》社以“青春诗会”的名义集中发表了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等人的作品，其它文学刊物也集中发表了这代人的诗。在1979年——1980年全国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评奖活动中，朦胧诗人舒婷和梁小斌的作品同时获奖。1982年，舒婷的个人诗集《双桅船》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第一届新诗集奖。1982年，甘肃举办的有关当代文学的大学生民意测验中，北岛被选为人们最喜爱的诗人之一。

从1978年《今天》的创办，到1982年朦胧诗被社会和诗坛承认接受，给予公认的好评，这个事实表明，当年集中在《今天》刊物上的青年诗人们已经突破了为写诗而奋斗的狭窄范围，而开始用他们的笔描写出一个时代转变的曲折痛苦的心灵过程。

当朦胧诗带着崭新的风格和整体流派的面目登上诗坛,造成广泛的社会轰动效果,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群青年人在写诗,而是为当代新诗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和深刻的影响。

一代人以他们对诗的变革和创新的姿态崛起在诗坛上,并经历了崛起后被社会承认的风风雨雨,这不能不使人反思到当代诗歌遭受的历史灾难以及由灾难演变成的对诗性灭绝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在新时期里依然残存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散,才使诗坛上下一时不能完全接受朦胧诗人的挑战,反而把他们的新诗当作“看不懂”的“怪异”作品加以指责。探讨一种文学现象的成败得失是一种理论行为,然而在对朦胧诗的争论中,不免掺杂了僵化保守的思想硬壳和极左遗风,使人们对简单明了,凭直觉就能把握的问题,陷入了较为复杂(但并非高层次的)争议纠葛之中。在朦胧诗论争问题上耗费时间之久,固然说明评论者的热情执着,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什么是诗情和诗性的理解和认识,已经退化到令人震惊的僵化程度了。这不能不使人反思到建国以来当代诗歌走过的狭窄道路。

建国以来,中国诗歌在颂诗声中拉开了序幕,这一序幕给人带来的感动和怀想不亚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魅力,并由此开拓出一个颂诗时代的节律跃进的诗风,也带来了当代诗歌的一个“划时代的发展”。^③我们当然不能轻易低估颂诗的价值,正如谢冕在评论朦胧诗时客观指出的那样:“一代为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建设而讴歌的诗人,以他们与时代高度和谐的诗的强音,赢得了历史性的评价。”谢冕又说:“这一诗的时代因毁灭文化的一场‘革命’而消隐”。^④也就是说,中国当代诗歌的颂诗时代,是在它“囊括了当代生活的胜利和挫折的全部丰富性”,^⑤并达到这一发展的极至之后,才跌入到文革浩劫的低谷

和深渊中,这一意想不到的历史挫折,同样给当代诗歌带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划时代”影响,因为在黑暗年代里,诗性的灭绝总是和黑暗到来之前人为的种种背离诗性、违背诗歌艺术规律的粗暴作法有关。在十七年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就讴歌的诗人掀起颂诗热潮之后,到1957年就有一批讽刺现实生活阴暗面的诗歌被打成“毒草”。六十年代初期,诗坛恢复了创作氛围,郭小川贺敬之就以他们优越的政治抒情诗成就统领了诗歌发展的前景。颂诗和政治抒情诗的此起彼伏,构成了十七年诗坛上的两大块诗歌景观,这足以说明当代诗歌一走上它的发展路程,就和诗人自身的情感需要拉开距离,严格来说,颂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写作(特指十七年时期)都不需要甚至抵触诗人个人情感的介入,诗只要在声律格调和内容形式上,为某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放声歌唱”就行了,这种以简单僵化的政治原则代替诗情诗性的作法,直接割断了诗人的情感向诗的脉管流动,也把诗和诗人都异化成意识形态的工具。当诗人一步步地被排斥出情感舞台和诗性世界时,灾难的来临就显得势在必行,并且还会变本加厉地把诗人拖进去,把他们吞没在扭曲变态的政治运动的浩劫里。

如果说老一代诗人只能按照历史节拍的规定走完某一段诗的历程,中国当代诗歌就在这种状态下逐渐出现了隐性而可怕的断裂层。动乱结束之后,最先在断层和废墟上站立起来的诗人,不可能是原来的一代,在人们惊奇的目光中走出来的诗人,恰恰是没读过书,没受过教育,却饱经政治风雨洗礼锻炼的一代青年人。在文革开始时,这代人被抛出了上学读书的正常轨道,不得不参与盲目狂乱的红卫兵运动;在文革期间他们不能就业,只能上山下乡;在文革结束时,他们几乎无法抓住高考升学的最后一次机会。这种种错位的安排,与其说是历史的差错,不如说

是对这代人心灵和情感上造成的一次次创伤。这代人就是在历史的错位和个人失落中,重新拾起做人的尊严,一旦社会解放的历史时机来临,他们不需要外在的影响,他们自己灵魂深处就会爆发一种人性解放的要求,自觉走上人权意识觉醒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的诗,喊出了这代人的呼声,和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汇合在一起,并重新迸发出一种人道主义的感染力量。在朦胧诗的影响下,诗坛上下出现了与“五四”时期人文思想解放的精神氛围“酷似”的局面(谢冕语),从对人的自身解放的要求出发而产生出来的诗情,毫无疑问不带有任何“工具”色彩,它带着诗人自身的情感尊严。被推到地平线以下的一代人重新站立起来,那种觉醒的力量决不是用一般的“感恩之情”就可以轻易取代的,恰恰是这代青年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觉醒的特征,把他们和老一代诗人彻底区别开来。从朦胧诗人那里我们能分辨出历史痛苦的回音,而这种回音正与社会上拨乱反正的思想要求相一致,把个人情感和时代精神的需要相结合,使朦胧诗一开始就走上了与“五四”新诗相同的道路,它在对时代的启蒙中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价值,也自觉地承担起新时期民族振兴的责任感。

一代人觉醒之后,给诗坛带来的巨大创新就是诗歌中个人情感的回归和确认。自从当代诗歌进入它的发展过程,我们第一次在这代人的诗歌中看到了情感的面貌和个人抒情方式的自由表达。从1949年到1979年,当代诗歌走过了三十年的曲折路程,如果三十年的时间代价还不足以换来我们对当代诗歌走出峡谷,迎来新生的历史复苏的确认,我们将无法证明中国是一个诗的民族。然而,诗就是在灭绝后的抗争中显示出顽强的活力,一场死而后生的文化浩劫,不正是诗人获得独特生命的最好时机吗?正是当代诗歌被政治捆绑了许多年之后发生的“物极必反”的结果,造就了一代人和他们的诗。朦胧诗出现之后,我们有

理由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它实现了几代诗人付出不同寻常的精神代价,换来的诗的探索的成功,诗无论经历怎样的曲折和变异,都不会在诗的内部死去,它只能在诗的内部诞生。

中国新诗的历史不会因为某一时期的曲折和逆转而被割断。回顾“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很容易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找到各种诗派的名字。白话诗、自由诗(浪漫诗)、新格律诗、象征诗、现代派诗歌、中国诗歌会、艾青和七月诗派、九叶诗人等等。现代诗坛风格流派不断起伏变化,繁荣不衰的原因,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开放影响有关系,但其中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诗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现代文学诗歌流派中创作个性的来源比较复杂,总体上说,是诗人们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精神,把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和新诗发展所要承担的时代命运结合在一起,在时代和个人这两者关系中,诗人个性解放的要求和觉醒起着决定性作用。粉碎“四人帮”之后,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浪潮依然回归到“五四”精神的源头上来,仍然是以人的解放为宗旨,以人文精神意识的觉醒为特征,这就产生了朦胧诗对个体生命价值进行追求和表现的权威版本。1978年,文坛上兴起过对“伤痕文学”的讨论热潮。早期的“伤痕文学”特指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的一批短篇小说创作,这些小说在处理青年题材时,只注意描写“四人帮”对青年们表面上的迫害,(不许他们学知识、学文化、穿裙子),而没有站在一代人的文化心理受到摧残损害的历史高度上,去反思他们的创伤。“四人帮”对青年的倒行逆施,不仅是要他们成为文盲,更重要的是扼杀他们的青春生命,扭曲他们纯洁正直的心灵,这些深切的社会批判内容,在粗浅的伤痕小说里不可能被触及到。所以,即使新时期来临,青年们的痛苦和内伤也没有在文学作品中被真正揭示出来。如果青

年们自身没有独立成熟的反思意识，只等待社会上的文学家在创作题材上去关照他们，用“救救孩子”的口吻抚慰一下他们的伤痕，这将会再次造成新时期条件下的青年悲剧。朦胧诗一代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诗坛，自觉地承担起青年自我解放的使命。当我们认真阅读朦胧诗，发现这代人灵魂上所承受的创伤，足以使他们的思想成熟到驾驭自己的生命之船经历任何风雨，把个性解放和社会思想启蒙的目标联系起来，便形成朦胧诗人所具有的极为鲜明的创作个性。这种创作个性和现代新诗史上诗人的个性构成一面反光的镜子，使我们看到，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只要诗人能够树立自己的个性思想，能够独立自主地为自己歌唱和为社会歌唱，诗歌都有可能出现新时代的繁荣。当代诗歌发展三十年来最值得反思的一幕，就是诗人丧失了这种个性解放的权力，诗人只要在社会条件的允许之下找回失落的自我和个性，就会很自然地扭转诗歌发展的大方向。这一代人自觉地选择了诗作为自我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武器，这种选择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正如北岛在最黑暗的年代里所写下的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交出”。一代人就是这样坚定地树立起自己对诗的信念，被埋葬十年的青春终于在一个早晨变成了一座座活的火山口，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当代新诗向着鲜活和创造性的时代变革发展呢？

尽管对朦胧诗崛起的论争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仍然看到这场论争给当代诗坛带来的另一种层面上的震动，就是当代诗人和诗评家在这场讨论中，加深了对新诗潮现象的理论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并在讨论中扫清了个人思想深处的诸

多障碍,在论辩中逐步澄清了朦胧诗出现的意义和价值,并由此建立起新时期诗歌研究和批评的崭新观念。应该看到,任何一种新文学现象的出现,都要求批评家用新的文学价值观去解释它,只有这样,批评家才能随着历史的脚步一起成长。回顾朦胧诗讨论的基本过程,就会发现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同样都是宝贵的。

最初,朦胧诗作为一种新文学现象引起社会上的关注,老诗人公刘最先发表了评论顾城的文章,《福建文学》也在1980年2月展开了对舒婷诗歌的讨论。在讨论自然进行的情况下,谢冕于1980年5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把讨论引发到一个重要的中心问题上,即怎样看待朦胧诗的崛起?这个新诗派的崛起究竟为当代诗歌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谢冕的问题提得尖锐及时,在新诗发展的历史契机出现时,敏锐的诗评家和诗人一样,都率先听到了时代的足音。在大多数人还不敢十分肯定自己是支持还是反对时,谢冕引导人们从中国新诗发展的大方向上看问题。谢冕指出:“一潭死水并不是发展,有风,有浪,有骚动,才是运动的正常规律”,他旗帜鲜明地鼓励新诗接受时代挑战,同时呼吁批评者对青年们的探索要有宽容理解的精神。在讨论初期,人们只是针对现象发表直觉性的看法,谢冕从新诗发展的历史角度提出问题,把讨论话题导向了诗歌领域本身这条中心轨道上。1981年,孙绍振在《诗刊》第3期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孙文沿用了谢冕前期提出的“崛起”一说,并把一代“新人的崛起”,发展成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孙文认为朦胧诗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感情和个人价值观念的觉醒,是新诗美学原则崛起的核心标志,并从文化思想内涵上概括出朦胧诗流派的美学追求方向,肯定诗人的创新特点。1983年,徐敬亚在《当代文艺思潮》第1期发表了《崛

起的诗群》一文，继孙绍振对朦胧诗的思想内容进行探讨之后，又从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对朦胧诗进行综述评论。徐文对朦胧诗中出现的现代主义创作倾向，大量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手法问题，作出具体详实的分析。到此为止，“崛起派”批评家对朦胧诗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合理性，以及朦胧诗为当代新诗发展带来的超前影响，做出了比较完整的探讨和总结。

对朦胧诗讨论的主要线索和有关代表性文章进行回顾，有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上看清朦胧诗对当代诗坛思想开放和创新氛围带来的影响。诗评家和文评家需要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文学信息，来促进自己思想的活力和理论建树。然而在长达十年，甚至是二十七年的沉闷压抑中，批评家被遗弃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连文学本身都不能讲真话，评论者又能表述什么呢？当文坛的春天随着严冬的消失突然来临时，因长期受压抑而习惯了用旧思维看问题的“天性”，仍然折磨着每一个步入新时期的思考者。在这时，只有自觉地抖掉旧思维，敢于发现新问题和表述新问题的批评家，才能和时代要求保持同步，甚至超越性地看到时代前景。所有的问题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方向。方向一旦被扭转过来，速度就不是束缚人的绝对障碍了，这时，一切速度都在自己的脚下产生。随着朦胧诗的崛起，新诗研究和新诗评论的崛起也在加快进行着。如果说“朦胧诗的崛起”只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在朦胧诗崛起中被充分激活了的文艺批评和文艺思想论争的繁荣局面，又使我们看到，在整个新时期里，作家和批评家们思想活跃和解放的程度，都处在时代的沸点上。因此，朦胧诗运动不是一种孤立的流派行为，它汇合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觉醒和跃动的脚步声里，成为新时期文学阵容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必须明确，评论家对一个诗潮或一个流派发表看法，并非是

把对它评论的价值标准记录在诗人自己的头上。如果把朦胧诗看作是“五四”新诗运动以来,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的高峰,站在文学发展史的整体视野上来观照它,像对待历史上任何别的诗派和文学流派一样,我们也许会更早地走出思维的误区,更加欣慰地接受春天带来的成果。

注释:

①引自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51页。

②舒婷《生活、书籍与诗——兼答读者来信》,《福建文学》,1981年2期。

③谢冕《历史将证明价值——〈朦胧诗选〉序》,《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版,1页。

④、⑤同注③。

第二章 朦胧诗的文化主题

“我不相信”，是北岛的代表作品《回答》中的一句诗。早在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四五”诗歌运动爆发时，《回答》这首诗就和那些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战斗诗篇一起，粘贴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由于当时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基本上以古诗文形式为主，像《回答》这样冷峻新异的自由体诗，和别的诗有些不同，所以好几个天安门诗歌选本中，都没有收入这首诗。1979年3月，《回答》正式在《诗刊》上发表，“我不相信”这四个大字，就成为和北岛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生活的宣言。

“我不相信”是一代人对“四人帮”极权统治和十年动乱生活的“反回答”。如果从这代人灵魂扭曲的根源上来理解它，这就不仅是一首诗，而是一代人的思想成长起来的见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争？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当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北岛《回答》）

在《回答》的第一节中，诗人用四句话写下了一个时代的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只有一种人可以自由生存，就是手持“通行证”，为那些高尚的牺牲者铺垫死亡道路的人。他们得意地穿行在死者的坟墓之间，连天空都变成了镀金的颜色，呈现出假意的灿烂辉煌。“在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倒影一般是投射在水中的，诗人把它想象为投射在天空上，这个奇异的联想，揭开了天空的真相，辉煌的背后有死亡的冤魂，那些被文革中冤假错案迫害致死的无辜的人，因死不瞑目，连身影都不能舒展。“弯曲的倒影”是象征，也是暗示。这些沉冤的亡灵本应是埋在地下的，诗人让它们“飘浮”在天空上，用天堂的光芒反衬地狱的黑暗，寂寞，造成强烈的反比效果，这是十年动乱在人们心灵上的真实投影。

当一代人的眼光足以穿透现实的黑暗，望着远方即将出现的黎明，他们对生活做出斩钉截铁的回答是完全正常的。“我不相信”这个具有时代性的叛逆思想，是十年动乱赋予这代人的特殊品格。

北岛诗歌的激情来源于对黑暗年代的反叛，同时，他又把反叛的力量凝结在一个大写的“人”字上。在《回答》的第三节，出现了这样一个青年形象：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这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

如果有一种真理和信念，值得去追求，去牺牲，去献身，“我”就是这种真理、正义、人格的化身。“我”活在世界上，就是为迎接追寻真理带来的必然结果，被捕，入狱和死亡。“纸、绳索和身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财产，也是“我”对生命的唯一需求。在黑暗的年代里不仅有恶魔，有帮凶，而且有苟活者。为了“活”字，

很多人可以死去，为了“死”字，很多人可以活着。在真理的追求者看来，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它带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人格”。

这节诗中的“我”，显然是一个牺牲者。“我”从容地把自己展示在“世界”面前，世界还是世界，“我”改变不了什么，但通过世界对“我”的审判和谋杀，“我”却具有了最真实的人格的内涵。世界又为它自己增加了一个新的“挑战者”，这个挑战者发出来的声音——简单的回声，就足以使人相信，“世界”在动摇，它用极端不自信的手段驱赶着它的反叛者，带来的却是他们的真正觉醒。

北岛的诗所以激动读者，是因为他塑造的反叛者的形象是一个精神上的信徒。这个信徒对“死亡”的追求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当他确认一生注定要追求真理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给了“死亡”。生命等于死亡，死亡才能证明自己活着，用最宝贵的东西交换真理，让这个世界有“新的转机”，这就是“我不相信”的真正含义。

“我不相信”是一个极端叛逆的口号，在叛逆的死亡线上，北岛描述出一片生机：“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在冷峻的背后是温情的期待，在死亡的白光里有渴望生存的要求。如果认真体会这代人的心态，就会发现，叛逆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叛逆只是一种姿态，一种语言，而支持他们做出这种绝决果断“回答”的，是他们心目中的正义和真理。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就是这个大写特写的“人”。

北岛的诗基本上是在这个大写的“人”字上构成张力和激情。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中
流出血红的黎明

（北岛《宣告》）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谋杀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在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古老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